**heritage/遗产(Yí Chǎn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Aleida Assmann | 07 Jun 2022 |

**最近，遗产又成为了一个话题和关注的焦点。**

在冷战期间，“遗产”一词并不存在。这是缘由那时盛行的资本主义，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。这两种意识形态都不重视过去，并希冀于从壮阔的未来中获得一切。我称其为“现代性的时间制度”。当其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侵蚀时，这一影响被福山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描述成 “历史的终结”，这一说法往后时常被重复，但也时常遭到反驳。铁幕的倾颓无疑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。恰恰相反，它是历史的回归和“记忆的肇端”。在此之前，记忆一直是个体心理学的一部分。为对其相关性和可能性收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观念，它必须被重新概念化，变成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有关概念。我们自己的“文化记忆”概念，是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时期，试图对传统与传播的概念，开展一种更广泛和更跨学科的路径。这也是“遗产”一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之时，“遗产”成了大学教职席位的一个新名词出现于学术界。这一术语自初便存有争议，因为它以不同的方法和目标向着两个方向发展：一个是肯定的，一个是批判的，前者支持右翼和保守，后者支持左派和进步的方向。诸如“记忆”和“遗产”这样的术语，遭受了左派的激烈抨击，（因为）他们看到了民族主义言论，和排他性身份政治的危殆与隐忧。这场争论的一个影响是，大学的一些院系，将其名称改为“批判性遗产研究”。

**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知识的“遗产”概念之崛起**

请让我从一个重要的语义区别开始谈起。我们绝不能把“传统”和“遗产”这两词混为一谈。“传统”这一术语，适用于宗教和哲学、音乐、艺术或文学领域中的，文化文本和话语的较长或较短的历史。它可以回溯到古代，并被用于任何时代同文化的追溯。与传统有别的是，遗产这一概念，在历史中有明确的起源，即可以回溯到启蒙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。我想在我的报告中主张，遗产是一种新的历史知识形式的一部分，这种形式始自于1800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。

这种新的知识形式，是在破坏与保存之矛盾的共同演变中浮现的。法国大革命破坏了各种文化体制，如君主制、贵族制和教会的有效性和权威性。但这种与中心规范的暴烈决裂，并没有导向去破坏所有物质遗迹的，全面的破坏偶像主义（iconoclasm）。恰恰相反，它还导向了对不再具有任何规范力量的实物之珍视。这种新的肯定类型，可被称为：“历史价值”。有一位作者尤为值得提及，他创造了这种价值并将其奉为圭臬。我所要提及的就是阿贝·格雷戈尔（Abbé Gregoire），他塑就了这一概念，并发明了一个新的术语，这为奠定了新遗产概念的基础提供了帮助。他的术语是“恶意破坏”（vandalism）。它可以被定义为对任何一个人的物质文化的破坏，而目的是为了抹除有关过去的知识。阿贝·格雷戈尔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发明者。对于那些被法国大革命猛力击破和粉碎的传统而言，他并非保护者，但对于那些在革命期间被终止、抛弃和取消其价值的物质遗存（而言），他便是倡导者和保护者。他是一个全新课题的迎接者之一：对过去的保护，即作为历史知识的普遍主义课题。他认为对当下和未来失去意义的东西不应消失，而应在档案馆和博物馆中寻求新的归宿，此后可以交由专业历史学家来研究。因此阿贝·格雷戈尔应被认为是人文或历史的，人文科学（Geisteswissenschaften）的赞助人，他保护、珍视和解释过去的遗存，无谓它们对不断变化之当下的价值。他的名字在人文学科中近乎无人知晓，因为历史研究在承认和研究自身之历史的方面是迟滞的。

留意一下阿贝·格雷瓜尔的精神世界是富有趣味的，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，国家之构架和人类之构建之间，并无明显区别。他帮助（人们）建立了保存物质遗存，及处理文化过往的规范和规则，它们超越了个别国家的利益。他开创了一个普遍的视野，将这一观念扩展到人类，即成为保存物质历史的，负责任的一名代理人。

西方遗产的概念，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

* 在艺术方面产生了对过去的，明显的的浪漫主义想象。
* 在政治上，遗产则成为民族国家构建大背景下的一个动员项目。
* 在大学和博物馆中则是作为一种学术课题，并最终导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。

**艺术与过去的浪漫想象**

在欧洲的文化遗产史上，学术研究和视觉艺术携手同行。这种结合体现于一种新型的学者身上，他们出现在18世纪中叶的启蒙时期。他将对古典古物的强烈兴趣，与那对风景如画的废墟所伴随着的崇高品质的浪漫主义热情相结合。其中一人是罗伯特·伍德（Robert Wood），他去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历史遗址那旅行，很高兴能从内心深处体验到“场所精神”（genius loci），即一个历史地点的精神。陪同他的是一位艺术家，他在现场画出了对废墟的图景。这些图像的复制和传播，激发了一种新的视觉想象，它突破了文本和图书馆的局限性，而在地理空间中发现的历史地点，是可触及的物质之痕迹的宝库。浪漫主义对废墟的迷恋，是由这样的观念助长的：遥不可及的一切，可以在这里和当下的空间中，被重新发现和访及。这种对古代的崇敬，创就了一种新的美学典范，其中也包括本土和乡土元素，并由学术研究和公共教育举措（如博物馆展示）所推动。这种倾向很快就满溢了出来，并通过流行小说、地方委托、展览、上历史课和远足等方式，接触到愈来愈多的公众。

对古物的崇拜、对遗产的珍视和对已灭绝文化的高度尊重，成为了一种新形成的美学、艺术和历史意识的综合体系，被纳入了现代西方文明，作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，取得了它自身的吸引力。图书馆、剧院和博物馆，成为了这种宗教的现代寺庙，考古学家、艺术史学家和文学家，成为了它的牧师，历史遗迹和废墟的旅游景点，成为了现代朝圣的圣地。

**“国家遗产”概念的兴起**

“文化遗产”这一概念，在漫长的整个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，获得了（它在）政治上的支持。法国大革命后，（每个）单独民族国家有其历史与遗产的观念，变得极其强劲。一个个国家接连地复制了这种模式，并创立了各自的机构，包括与自己历史相关的，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，展览这种历史与艺术的博物馆，保存相关文件的档案馆，在社会上传播专门的教材与作品，以及——（确立）纪念日，在这些日子里，共同体（社群）在各种表演性活动和仪式中，确立、塑造和庆祝其集体的自我形象。

在文明与民主国家，这些特殊论（particularist）的发展，不会自动被滥用为仇恨、战争与侵略的政治工具，而会与一种普遍的构想和睦相处，即在通常意义上去保护民族遗产，是文明治理的一种标志。换言之，国家遗产也可在一个共同的，世界遗产的框架之中被看待，由“人类”所共有、珍视并保护。故此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，与这一新概念的创造和推广有所联系，在这之中，对历史和过去的尊重成为了一种新的普世宗教，正如人们所期盼的那样，促进“各国之间的和平和善意”。这个口号是为 1851 年的万国博览会（the Great World Exhibition）而提出的，并为保护国家文化遗产而被反复强调。

新的历史意识，以及对遗产的世俗兴趣，反映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增强之中。在这一背景下，遗产之概念成为一处日益增长的占领之地，涉及到自上官方的行政努力和自下的公民运动，参与到艺术、景观、地方传统和民俗（等领域之中）。但是，遗产的概念是广泛的，且仍旧是复杂的。其范围从重视“真确性”及守护过去的纪念碑的现代努力，乃至于简单的复古小说和通俗的神话幻想，而所有的这些，都可以在大众传媒、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中得以利用。

**作为跨国问题的遗产未来**

唯有“野蛮人和奴隶“，格雷戈尔曾写道，“憎恶科学，破坏艺术的纪念碑。自由人爱它们，并保护它们”。（斯文森（Swenson），34）破坏行为被理解为对新近所共有的，和国际正式批准的文化遗产神圣性原则的背弃。早在 1800 年，暴力夺取纪念碑和艺术品的行为，就被谴责为“反人类罪”。(斯文森，39）有意识地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，意味着严重破坏了文明国家的共同纽带（《文化国度》（Kulturstaaten））。遗产之概念，不仅建于价值观和情感上，也建造在不断发展的国际立法进程上。在制定战时保护平民和受伤士兵的规则（《日内瓦公约》）的同时，于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的规则（《海牙公约》）也被起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借助涉及新的法律举措、价值和标准的，更进一步的法规，新的暴行被回应了。尽管有这些法律上的努力与标准，但欧洲历史上被称为“瓜分非洲”的这一时期，其特点是残酷的殖民化形式，包括入侵、吞并、战争、奴役和掠夺本土艺术品。在 1881-1914 年间的“新帝国主义”的这段黑暗年岁，在如今又报复性地出现了，而其在当下是一个可耻的、难以解决的遗存（legacy）。

西方遗产文化面临着各种挑战：

* 激进的现代化文化中的冷漠与忽视
* 造就的侵蚀，借由污染和气候变化
* 使其暴露于战争、意外事故和恐怖主义的暴力（面前）。

在两次世界大战中，我们悲哀地了解到，并且今日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再次体验到，借助人道主义法律来划定战争的界限，是何其困难。保存乌克兰文化遗产的乌克兰博物馆，已被损毁。在100余日的战争后，泽连斯基总统抱怨称，多达100多座教堂已被损坏。他强烈要求，将俄罗斯这个“恐怖国家”，排除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外，并补充称：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野蛮人的一席之地。”

那些欧洲国家定义为“文明”的事物，普京等军事领导人，则更愿意将其定义为“堕落”。在一本书中的，破坏的动力（Dynamic of Destruction）的一文中，阿伦·克拉默（Alan Kramer）业已表明，用一种共同的、跨文化的语言来限定暴力的行为，是多么艰巨。他本人将“野蛮的暴力”一词，替换为“激进化的工业战争背景下的现代暴力”。他还指出了“野蛮”和“文明”这一对标签的相对性，并补充称，并非所有的国家，都渴望成为文明（国家）。换言之：这可能并非（尚且并非？）一个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标准。

因而（让）历史学家登上这一舞台，去讨论这些事件并讲述这些故事，是至为重要的。现在也正当是文化史学家加入他们之中的正确时刻，以将我们的基本概念，从一种语言和文化翻译成另一种。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转换，标记着相似性与差异性，并能引向对不同思想观念、价值观和文化惯例的去蔽。未来的一个急迫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有可能将遗产一词，抬升为一个概念，一种能从不同的文化视野，在全球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（的概念）。这可能是奠定相互尊重的一个重要步骤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创建一个联合项目来尊重、重视并保护世界各地的所有文化和惯例，毋论是物质的抑或非物质的，有形的抑或无形的。

**参考文献**

贝茨（Betts）,保罗（Paul），科里·罗斯（Corey Ross），编，在现代世界之中的遗产：国际视野下的历史保护（Heritage in the Modern World: 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），《过往与当下》（Past & Present Supplement ）增订 10，牛津：牛津大学出版社，2015。

克拉默，阿伦，破坏的动力。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文化与大规模杀戮（Culture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First World War），牛津：牛津大学出版社，2007。

舒林, 恩斯特(Schulin, Ernst),“拒斥，以及从过去恢复”（Absage an und Wiederherstellung von Vergangenheit），收录于：莫里茨·查基（Moritz Csáky），彼得·斯塔赫（Peter Stachel），编。《记忆的存储之地：图书馆》（Speicher des Gedächtnisses: Bibliotheken），馆藏，档案，第一部分：“拒斥，以及从过去恢复，对历史失却的补偿（Kompensation von Geschichtsverlust），维也纳：章节出版社（Passagen）2000,23-99。

斯文森，阿斯特利德（Astrid），遗产的崛起（The Rise of Heritage）.《保存法国、德国与英国的过去，1789-1946》剑桥：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.2013。